

华容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政协湖南省华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九日

目

录

起义前后的回忆

张先正

前 言	1
(一)、父亲和表兄弟给我的影响	1
(二)、开始了戎马生涯	2
(三)、决心带兵搞武装	3
(四)、担任少将总队长	4
(五)、寻找党组织关系	5
(六)、争取起义人员和队伍	7
(七)、为程潜主席保密	8
(八)、“株州事件”和周伟龙之死	9
(九)、被抄家和亲友受株连	11
(十)、反“匡剿”和登山	12
(十一)、被捕坐牢两个月	12
(十二)、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13
附 记	16

华容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政协湖南省华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九日

目

录

起义前后的回忆

张先正

前 言	1
(一)、父亲和表兄弟给我的影响	1
(二)、开始了戎马生涯	2
(三)、决心带兵搞武装	3
(四)、担任少将总队长	4
(五)、寻找党组织关系	5
(六)、争取起义人员和队伍	7
(七)、为程潜主席保密	8
(八)、“株州事件”和周伟龙之死	9
(九)、被抄家和亲友受株连	11
(十)、反“匡剿”和登山	12
(十一)、被捕坐牢两个月	12
(十二)、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13
附 记	16

前 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在湖南郴州车站发生了一起交警叛变截扣军火事件，株连伪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当时的伪中央各报纷纷摇唇鼓舌，大肆叫嚣了一番。其中情节外人很少了解。我就是当时叛变部队的负责人。为什么身为交警第一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的我要叛变蒋介石呢？这话说来可长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特就我参加革命，决心搞武装起义的前后追忆如下，藉以说明当时“郴州事件”与周伟龙之死的原因。中间如有出入，盼望知情者赐予教正。

（一）父亲和表兄弟给我的影响

我是华容插旗乡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我只十六岁，还在私塾念书。当时我父亲张振斌已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并被吸收入党（有老红军卢从望同志给华容县民政局的证明）。在农会，我父组织清算了当地著名劣绅杨必才的贪污罪行。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导致了湖南的“马日”事变。土豪劣绅卷土重来。眼看着多数同志杀的杀、关的关、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自杀殉国，我父亲忧郁成疾，不幸吐血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父亲逝世后，我辍学到叔父后铺当学徒。一九二九年因叔父商店遭受火灾，我只得离开叔父家，独自经营碾米维持生活。不到一年，亏损殆尽，不得已，于一九三〇年冬仍回乡佃耕地主五百旱土官生。一天深夜，我表兄邹福先（中共党员，系当时洞庭湖游击司令员，原华容汪市区工会主席），表弟邹清和（侦察员）先后悄悄地从洞庭湖来到我家。表兄弟见面，惊喜交集。惊者他们已参加革命，转入地下斗争，喜者是大家健康无恙，亲人重逢。当时表兄叮嘱我说：“现在的形势紧张，只能利用合法身分，暗中进行革命

斗争。我们兄弟的身分已暴露，不可能在家乡公开工作。现在只有你，可利用你兄儿女亲家王承熹**当伪铲共义勇队支队长**的关系打入地方保甲组织，掩护革命同志，并为我们游击队做点交通工作。”

我当时同意了他们的主张，并约定了联络暗号。临别时，表兄还再三吩咐：“积极行动起来，千万不可疏忽大意”！紧接着我即到伪区公所找到王承熹支队长，谈了我的要求。恰好王正在物色一位高东乡的义勇队队长，便欣然应允，委派我担任此职。我有了这个公开的身分，便千方百计暗中营救同志，并设法供给洞庭游击队的物资和情报。不料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际，传闻我表兄邹树先不幸在北京镇为革命壮烈牺牲，年仅十八岁的表弟邹清泉也在拒敌山上被敌人杀害。悲痛万分中，不仅仅我失去了革命的联络，而且引起了反动派对我的怀疑。不得已，我遂于同年九月潜逃岳阳，投身于招募新兵的行列，以期重找革命关系。

（二）、开始了戎马生涯

从此，开始了我的戎马生涯。先被编到武汉要塞第三团当二等兵，不久升上士文书和团部准尉司书。一九三三年春，团长胡松标作战不力被撤职，由合肥李锐铨任团长。所有团部官佐，亦由原来胡的广西佬换成了李的安徽同乡。我是仅留下的一个湖南人。不久，我承李提拔，以学名张钦典当上了**上尉军需**，专管团部一切表报。

一九三五年春，我被保送到北平军需学校特别学员班第三期训练。一九三六年夏毕业回部队任八十九师五三〇团代军需主任。此时团部来了一个四川万县姓邓的（什么名字记不清了）青年学生，在团部当军需上士，专管小厨房的伙食。一般人认为与他谈话格格不入，都不愿接近他。我倒很喜欢他，常与他谈这谈那，无所顾忌。久而久之，彼此敞开了胸怀，推心置腹，成为了知己。邓说他在中

学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也直率地把在家乡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活动情况，全部告诉了他。从此我俩打破了旧军队官阶的隔膜，成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兄弟。邓一再劝我不要长期当军幕僚，而要带兵搞武装，因为共产党需要的是用革命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邓的主要任务，是打入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一九三九年夏，邓当了连长，我当了汤恩伯部上校副处长。同年夏，邓在河南镇平县策反汤部一个团，使之归向人民，不料事为汤发觉，在其重兵包围下，团长、副团长和邓三人均为革命壮烈牺牲。

（三）、决心带兵搞武装

由于邓对我的帮助和期望，以及他为革命献身的英勇精神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我决心甩掉部队幕僚职务，找机会带兵搞武装，走革命之路。一九四一年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十三期学习，曾与蒋纬国同学。一九四二年春，我以派名张先正考入成都伪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九期。一九四三年十月毕业后，在四川叙永师区当补充兵团上校团长。一九四四年四月宁可不要当伪三十六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少将处长的优差，而坚决上前线去带兵。同年冬任陕西泾阳县晋豫边区挺进军少将副指挥官。一九四五年九月才往河南新乡任职，并兼任第五纵队司令。由于我暗中掩护营救过不少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同志，加之我是湖南人，而这个部队又是北方部队，我去的时间短促，部属关系隔膜。因之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河南修武县大韩村，部队被伪总司令王仲廉派兵包围缴械了。我领导这支队伍仅仅只有四个半月，以致使我搞武装带兵起义投向人民怀抱的这一打算，没能如愿以偿。

(四)、担任少将总队长

离开河南后，回到长沙入军官总队任少将队员。旋调南京中央训练团任少将团员并兼36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少将处长（设湖北路274号花园洋房内）。同年十一月选入中训团兵役研究班学习，为时一月，结业后派到湖南湘西师管区任少将副司令官，并兼桃源私立天禄中学（为刘戡创办）董事。

一九四七年夏，为学籍问题到南京打官司。同年冬，由伪国防部派到预干局当少将专员。局长蒋经国为了拉拢培植自己的势力，曾亲自接见了。我。

一九四八年四月因我与伪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有私人关系（抗战时在重庆他任别动军总司令，经同乡陆大学员谢齐家介绍有交往），他以我曾任湘西师管区副司令，搞过兵役工作，便派我到湖南接替喻勋衡（曾任交警九总队副总队长和总队长的招募组组长。八月以前，我在湘潭已募集了几千名新兵。当时程颂公主湘，停止征兵征粮。湖南地方势力拥程反蒋，已成了公开秘密。这时我手下已有几千官兵，心想即此举事，反对把部队交出。当即召集各中队长密谋策划。驻长沙的中队长夏先坤（我的内弟）自告奋勇，愿意负责解除接兵部队的武装；湘潭的两个中队愿负责夺取地方团队的枪枝。但由于驻平江的中队长罗廷的动摇，特别是由于没有党的领导，起义计划终于流产了。我被迫只得将一手招募来的几千新兵，全部交给了交警八总队总队长邓季之（他的总队开到上饶后全部被我军解放）和其他的接兵部队。

随即我到南京向伪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述职。周因不知我的内情，反认为我在湘募兵有功。他仍命我回湖南继续招募新兵，并组成两个交警教导总队（番号为教导一总队、二总队）和原属九总队的一

个大队，并委我兼任教导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周下手令后，就到外地视察去了。人事室查出我不是军统分子，不予发表（交警总队实际受军统控制，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军统手里，高级干部一般是军统的人）。我在等待命令的一个月里，常去总局秘书长锺贡勋（军统特务，和我在高教班同学）家串门，请他关照。一个月后，周公半回局，批评了人事室，立即发表了我的任命。同时还发表招募组副组长邓震模（他的总队开到台湾去了）任教导二总队长，毛羽芳（现在江西上饶市任政协常委）任九总队大队长。

九月底，我持国防部文件到湖南省军管区交涉，得知程潜主席不准我们采湘招兵，我揣想程在湖南可能另有图谋。当时任省府秘书长的邓介松，过去在南京时因房产问题，曾请朱宜山介绍要我替他帮过忙。我便利用这关系，托他求程主席通融。我对邓说：“介公，我们两个教导总队长都是湖南人，只要颂公让我们在湖南招兵，今后一定唯颂公的马首是瞻，尽力报效！”通过这条渠道，果然得到了颂公的支持，解除了招兵禁令。我们也就很快完成了招兵任务，建成了交警教导总队，为以后相机起义归向人民，准备了条件。

（五）、寻找党组织关系

鉴于前两次起义计划流产的教训，在这次兼任了交警教导总队长，重又掌握了武装后，我决心多方面去寻找党的关系，在取得了党组织的指导与协助后才行动。曾经历了如下曲折的历程：

1、注滋口有一位延安抗大四期毕业的王家训同志和我同乡，为了找他介绍党的关系和征求他的意见，我于一九四八年冬派人专程请他到我家里谈心，明确地告诉了我的希望和打算。王回答说：“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可惜我现在与组织已失去了联系，待你起义后，我可为你去香港找到党的关系”。

2、焦大梯（与我都为红帮、程潜起义时任地下第四军师长，解放后被镇压，现已平反。）在未任浏阳行政专员之前与我要好。我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要求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你可以设法为我介绍吗？”焦说：“香港来了一位同志，现到江西去了，待他回到长沙后再给你介绍”。

3、在衡阳的一个晚上，我会见了黄克虎同志（系当时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处长），他邀我同往在一家旅社的房间里。彼此交换思想情况，谈话十分投机。我们又一同坐车回长沙，并请他到我家。这时我明确地告诉他我要找党的关系起义。黄说：“唐生智在上海已与党挂上了勾。”我深知黄系唐生智的学生，一向关系密切。这次和他商妥了由黄亲自去郴州策动教导二总队长邓寂光与我一起起义，并协同扣留伪交警总局库存郴州的美械装备。黄去后起义工作未做成功，即派专人送给我一封信。内云：“合伙营业不可能。我兄单独营业可也。”

4、一九四九年一月，我派总部搞人事的干部徐玉龙（现在长沙市财政局退休）去宁乡找姜亚勋（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同志联系。我想通过姜的渠道一定能找到地下党组织。有了党的领导，我的起义便可以成功了。不料在徐抵达宁乡时，姜部正遭反动派“围剿”，没有取到联系。

5、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我曾托邓介松同志请示颂公，关于扣留伪交警总局库存郴州美械装备问题。过了几天，介松同志回答我，颂公同意扣留。由此，我也就更清楚地掌握了颂公的意图。

6、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在喻勋衡家里，由他介绍汤中（现年已85岁，住省疗养院）同志和我见面。事先，喻曾告诉我汤系共产党员。因之在见面后，我对汤十分尊敬，并表示愿意接受

党的领导。时汤也向我交待了党的政策和当时有利的形势。以后我们往来过几次，我迫切盼望他为我引见地下组织的领导同志。但他只是鼓舞我积极采取行动，并强调了领导同志暂时不能出面的某些客观原因。这时他并将他的儿子汤健民（现任省物资局纪检书记）和妹妹汤子声（原任邵东人民法院院长，文革中被整死，现已平反）介绍和我认识了。这二位也都是共产党员，汤子声同志系长沙市骥子桥小学教师，以后这里便成了我们联系的地点。这次，我总算找到党的领导了。

（六）、争取起义人员和队伍

在长沙与地下党员汤羽中同志取得联系后，在他的指示下，我即积极设法争取起义人员和队伍，中间做过以下一些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今分别将经过简述于后：

1、益阳夏步云（曾任益阳县伪团防总局长，解放后已镇压）是一支著名的地方势力，通过我总队军法官夏殖华（与夏步云为堂兄弟）做工作，将他请到我家，向他谈了目前形势，说明当今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劝他和我一道起义，达成协议后，共同归向了人民。

2、沅江张青年也是地方实力派，通过关系也把他争取过来了。

3、华容县徐尚这有上千地方武力，也派人去做过他的工作，不过未打通思想，据说徐以后跑到香港去了。

4、争取智勇兼备的陈行中同志（抗日战争时我在重庆的朋友，高教班九期同学）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备为党做些联络策反工作。因我深知陈与孙立人（曾任国民党税警总团长、新一军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的私交甚密。解放后，陈在湖南草大学习期间，受党派遣前往台湾，策反孙立人倒蒋。一九六七年政府通过外调，证实

了这个问题（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参考消息》曾载台湾报纸消息，孙立人因窝藏匪谍密谋犯上，一举被捕了二十多人）。

5、千方百计争取伪交警九总队大队长毛羽芳起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曾向我密报了伪总局将衢州军火运台的列车，停在醴陵车站的情况。

6、举地下党领导人指示做好伪交警四总队长李让（解放后被镇压）的投明工作。

（七）、为程潜主席保密

众所周知，陈明仁将军的起义，如果不是程潜主席的说服，是不可能的。因陈驻长沙后，已作好巷战准备，同时捕杀地下共产党员（其中就有一位曾到过我家的欧阳同志。以后汤子声同志和担任过我的交通联络的夏钧同志还曾前往掩埋欧阳同志的地方凭吊，寄托哀思）。

这年三月上旬，伪保密局曾派高级特务锺贡勋飞到衡阳，立即派人将我找去。见面后锺首先将特务头子毛人凤的亲笔信给我看，并对我说：“我们是老同学，你又是交警的将领，是在湖南组建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湘工作的时间长，必定了解不少湖南的情况和程主席的意图，希望你把所知道的尽量对我谈一谈。”我知道锺是毛人凤的亲信，当初在南京发表我当总队长时，曾予关照，后来在主子周伟龙被捕，毛人凤要撤换我的时候，锺也曾出面为我担保。他就是想利用这层关系，把我拴到他们一起。他希望我在湖南监视程主席，并把所招的两个总队、一个大队的部队开往台湾。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便是出卖程潜主席，死心踏地地做反动派的鹰犬。如果不这样做，后果恐怕也是十分严重的。我还记得当时伪浙江省主席陈仪，因密谋起义，为其部下告密而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的

情况。

然而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是时常记着父亲的遗训和表兄弟为革命惨遭杀害的仇恨吗？我不是时常记着要革命，要脱离反动派，早日回到人民怀抱吗？我绝对不能这样做，一定要为程主席保密。因此，遂回答锺贡勋说：“程颂公回湖南后，以家长自居，有些事情未按中央的指示办，那是事实；至于说他倾向共产党想搞和平计划，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我们切不可庸人自扰，自设藩篱。”锺听后甚以为然，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握手告别。

（八）、“郴州事件”和周伟龙之死

保密局既多少察觉了些湖南的情况，虽然我这次在锺面前把程潜主席的意图掩饰过来了，但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存在。因此，我在回到部队后，立即着手起义准备。三月十五日又再次来到长沙，会见了邓介松，同时晋见了程主席。程即下手令派我为湖南保安司令部少将旅长，下辖三个团，即以我部交警编成，并嘱我三个各团长。随后又谈到郴州库存的美械问题，由于伪参谋长刘嘉澍的阳奉阴违，让其运走了。程听后为之十分可惜。同时我根据毛羽芳的密报，告诉他醴陵车站停有美械列车，请示处理办法。颂公嘱我次日到绥署来谈。

三月十六日我到绥署，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颂公，当时杨继荣也在座。颂公指着我向杨说：“有人要危害他！”但杨听了默不作声。关于扣留醴陵美械装备一事，程却一句未提。而杨继荣系伪中央放在颂公身边的特务，谈话大家都具戒心，不便启齿，故也没有获得结果。

这件事，程潜既无明确指示，我只好当天晚上到戴子桥小学去找汤子声同志，向党组织请示。恰好汤菊中父子都在那里。我即将

此专题汇报，他们一致主张我去扣留。我说：“我的主力部队还在衡阳茶市，调兵来不及，怎么办？”汤说：“你们已带随身部队去扣嘛！只要不让这批美械运往台湾，就是对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临别时汤还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犹豫！”但我仍须考虑此举对我个人的影响。三月十八日我去找了我的好友三一四师副师长祝凯，并将颂公派我当旅长的手令给祝看了。祝说：“这是大智大勇的问题，既有地下党的重托，千万不可错过时机，让我运往台湾！”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和勇气，我决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立即率部起义，打响拥程反蒋迎接解放的第一枪。

三月十八日我带了黄渡韩大队长，羊参谋（名字忘了，后来他们均为革命牺牲了）和军械员何海泉、区队长高仁胜（后来为游击时牺牲）等，率领警卫部队三十余人，深夜赶到醴陵车站，当晚摸清了列车情况。十九日拂晓，一举夺取了军械列车，扣留了押车的官兵，勒令站长将列车驶返株州。当晚列车到达株州站时，适逢大雨冲毁了桥梁，无法继续开行。

不料二十一日清晨，伪长沙绥署二处处长、军械特务谭谔，伙同当地驻军八十八师对我区队进行围攻，发生激战，一直闹到闭市，交通断绝。因众寡悬殊，我方死伤军民十余人。这次劫车虽然失败，但一批八千余件的枪枝弹药，没有被运走，乃由八十八师以送到了长沙绥署。

事后，我仅带一卫兵脱险。原拟仍回衡阳茶市，因闻驻茶市部队已被包围，只好只身潜往武岗，去与我早有联系的起义部队贺德非处栖身，再相机与部队联系。

这一次的“株州事件”，震惊了当时的反动政府，各地大小报纸均竞相报导交警教导一总队长张先正叛变的消息。这时正值淮海

战役之后，蒋介石已丧魂落魄地退居老巢奉化，并以他的王牌交警部队担任警卫，幕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死心与人民为敌。当时他已派宋美龄到白官哭丧，乞求美帝派遣军队为蒋封锁长江，妄图能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正当此关键时刻，交警部队在渝叛变了，美帝认定蒋介石部队组织破产，军心涣散，认为蒋枉费心机，便给宋美龄碰了一鼻子灰。蒋闻悉后痛心疾首，立即追究责任。一查张先正既非军统，其交警总队长一职纯系周伟龙擅自委派，并未通过保密局，因此大发雷霆，怒不可遏，遂下令将他卖命多年的特务头子之一的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在台湾新竹杀害。原想跑到台湾后依靠留美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同过学的孙立人将军为其卖力，争取美援训练新军，妄图反攻大陆。正当这一如意算盘打得响亮的时候，不料共产党又派出了一位曾与孙有密切关系的陈行中同志，潜赴台湾，说服了孙立人，决心反蒋。因此再一次砍掉了蒋争取美援的一只脚。

（九）、被抄家和亲友受株连

“株州事件”发生后，我身怀六甲的妻子即抱儿带女亡命他乡。在送她出走的包车工人回到家里时，来抄家的特务行动队长龚启新即拘捕了他，并严刑拷问我的家属何处去了。好心的车工，忍着严刑的痛苦，只说不知道。最后又拷问他，平素张家常来往的地方，则被带到我堂内兄夏殖民家里抄查，找出一只有我名字的金戒指（因我的箱子和细软已转移到了这里），于是断定这几口箱子是我的，便全部没收了。外甥刘炎（现在河南省建筑厅工作）当时未考上大学，住在我家补习功课。抄家的特务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即将其抓走，并扬言要杀掉他。最后通过夏殖民的关系，送给特务头子谭讷的老婆六百元现洋，才把刘炎救出来。我弟弟张河清也被捕

入狱，备受苦难。至于家里的什物如收音机等稍为贵重的东西，均被洗劫一空。特务坐探一连骚扰了好几天才走。

(十)、反“围剿”和登山

当时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派部队对我茶市驻地进行围剿，伪交警总局派来监督我部开往台湾的少将督察长曹铁身、我总队上校副总队长夏晨阳和督察室的特务们也趁我不在之机极力反对部队起义，大叫大嚷要把部队开往台湾。但我早已将可靠部下秘密作了安排：万一我发生意外，部队统归严文端大队长领导，坚决不开往台湾。

当大队政训室主任特务刘英煽动中队长严振世拖部队开往台湾的紧要关头，严振世向严文端汇报了这一情况。严文端立即下令坚决镇压刘英，并率部队登山，避开敌人的封锁线与地下党陈采武同志接上了关系。而曹铁身、夏晨阳对整个部队无法掌握，仅仅拉走了宁乡、邵阳两个中队。因为这两个中队长都是交警总局派来的。我搞起义活动时，避开了他们的耳目，就是为免貽误戎机。当部队登山以后，反动派还将被我镇压的刘英尸体挖出拍照上报（此事解放后公安部作过调查证实）。

不久，严文端受地下党组织指示，所部归刘人奎领导，严文端任副职。在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与刘人奎交谈中，刘人奎还曾对我说：“严文端毫无打游击的经验。打了败仗，一人脱险回到部队，我很生气。不久，便把严文端介绍给蔡杞材和颜健同志去了。”

(十一)、被捕坐牢两个月

我在“株州事件”中脱险后，试图步行回驻地。旅派我部羊参谋前往部队喊派兵来接，不幸羊参谋在途中被反动派截扣牺牲了。为此，我只有去武岗找贺锡非部。回月一日，詎料行至竹杆糖，被

一百军一九七师团长曹祥斌截捕，并押送到长沙绥署。其实曾是我在伪军校高教班的同学，只因立场不同，同学友谊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脚镣手铐，打入牢狱，并受到百般敲榨勒索。通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我又暗中写信给颂公，才解除了镣铐。颂公告知仇亦山先生说：“张先正关在监狱，比在外面安全。因为在外边，特务会随时暗杀他的。”仇老通过他的同乡曹霄云告诉了我爱人，并嘱不必担心。这时伪国防部以我系军事要犯，曾一再要提取我去，但均被颂公以问题复杂，应就地审判为由，拖延了下来。因颂公的情况我很清楚，如我被提交国防部军事法庭，固然只有死路一条，那么颂公自己亦十分不利。那时我猜想他不让提走我，既是想保全他自己，也是想向共产党显示真意。果然在蒋介石属犬刘慕澍调走之后，程颂公就采取措施，将我释放了。六月一日出狱，不敢回家，便住在程主席的警卫团卫兵连夏伐夷排长（现在湖南鲤鱼江电厂工作）处。

（十二）、终于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六月三日，汤菊中同志高兴地找到我说：“过去未替你引见党组织负责人，是为了党的安全。现在铁的事实证明了对党对人民的忠心，党的领导同志也盼望和你见面。”当即约好了时间地点。第一次会见了地下党负责人涂西畴同志（当时地下党军事策反组组长现任湖南财经学院院长），他精辟地分析了当今一些问题，规定了组织上的称号“黎明旭”，我的代号“白金典”作为联络暗号。同时嘱我作好交警四总队队长李毅的策反工作。并再三叮嘱我说：“去和刘人奎同志联系以后你要帮助他掌握好部队”。

于是我立即找到了小同乡，也就是李毅的好朋友黄毅夫，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李坚要与地下党领导人亲自见面。我

向涂西畴同志汇报后，开始涂有些顾虑，在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后，才同意在第二天带去见面。涂同志和李谈了一个上午，终于释去了李的各种顾虑，李遂决心起义，投向了人民怀抱。

策反李部的部队起义完成后，即由程颂公的警卫团长程元（颂公的儿子）特派夏伐夷排长率警卫护送我去宁乡县境内的游击队，恰好这时毛羽芳也派人来接我，番号是“中国人民自救军湘中纵队”，政委即地下工作者汤荆中，司令员为何际元，副司令员为我和喻勋衡；杨一舜为参谋长；周励吾（何、喻、杨、周四人解放后被镇压，现均已平反）为政治部主任；毛羽芳为支队长兼第一团团长，陶凯为二支队长……我到达游击队驻地的当晚，即遭敌军袭击。在汤政委的指挥下，游击队立即转移，让敌人扑了一个空。接着汤荆中和姜亚勋部政委徐上达同去姜部研究如何切取联系，更好地开展游击活动。我到毛羽芳的游击队不久，原交警流散在河西的人枪，也由黄威韩召集拢来，编为毛羽芳支队第二团，我当即委派我为该团团长。我率领了这支部队行了一天军，傍晚在一个村庄宿营，正在埋锅做饭，反动部队刘勋浩的八十八师跟踪追来，我们弃饭登上附近的一个山头，派廖经纬的中队封锁了山口。根据敌军以在我原宿营地村庄驻下的情况，乃派毛维凤中队的一个区队长率部骚扰敌人，敌即向我山口猛攻，我却趁黑夜从后山滑下。待天亮转移时，又发生遭遇战，终因众寡悬殊，部队只好分散脱离接触。经过三天三夜的行军和战斗，我们才在宁乡某煤矿附近会合，部队无一伤亡。但在碑头市和道林两地游去时，我方的情报联络员周正彪和周敏二人却不幸遭敌人杀害（现二人均已追认为烈士）。

这时汤政委适从姜亚勋处公毕归来，恰逢桂系第七军会同刘勋

浩师围攻准备起义的三一四师，我部又与之遭遇。突围时，汤因年龄较大，行动迟缓，一度陷入险境，经我命警卫班死力掩护，才得以脱险。

在敌人不断“围剿”，部队日夜奔驰，伤病员逐渐增多，而医药又非常缺乏的困难处境下，七月中旬，党组织要夏钧（我的堂内姐、交通员）给我送来指示：要我注意长沙河西在军事上的价值和陶凯支队的行动。我即与汤彩中政委商量，将部队作了如下部署：汤、何仍率陶凯的部队在宁乡花明楼、龙凤山一带游击；黄威部回长沙河西活动；毛羽芳率部队渡洞庭湖转战华容一带（解放后毛部武装交给了湖北军区汉水分区杨振东部），廖经纬（毛羽芳部中队长）率部回宁乡杨林桥继续游击，喻勋衡回他家乡游击。

我个人则带了几名警卫和夏权森中队转战至益阳八字哨，策动当地驻军夏识时、夏先坤两个营和周柏林部武装起义，获得了圆满成功。七月下旬，经汤子声介绍，由三一三〇组织得我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五师，我任代司令员。毛羽芳、夏识时、周柏林分任三个团长。夏先坤调师部人事科长，以前在东北长春起义的姚凤翔任参谋长，他保荐了文觉任参谋处长，夏权森任副官处长，曾广荣为干事。

我持涂西畴同志给我的亲笔指示信与进军益阳的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取得联系。旋奉十六兵团的命令：部队由益阳军分区领导，度放给养。直至十月，部队整编，干部入益阳政干校学习，我调任益阳专署参议。

决心革命，经过二十年的戎马生涯，我终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来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

• 15 •